

淺論院藏黃釉雙獸耳罐

王崇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黃釉雙獸耳罐三件，過去經常以獸耳罐帶過，然同式異色的作品亦見於院藏與其他博物館收藏，該器肩帶雙獸耳的器式特色，不僅可以遠紹宋代《重修宣和博古圖》的「著尊」，現代學者也多能參照清代《皇朝禮器圖式》所刊，將之納入祭祀的框架中。藉由這些研究成果，院藏黃釉雙獸耳罐便可置於適當的脈絡來加以解讀、理解。除此之外，從《重修宣和博古圖》到《皇朝禮器圖式》之間，此一帶有雙獸耳特色的器物造形，也在時間長河中有了面目上的改變。本文便從此處著手，以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為中心，述論院藏黃釉雙獸耳罐一類器式的流變。

引言

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圖一，典藏號：中瓷1543），通體罩施明黃色釉，圓口略侈，短頸，豐肩下斂。肩有二獸耳，平底內凹為足，足內刻黃釉地「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篆款。此器曾於一九九八年赴法展中展出，其說明文字並載《故宮文物月刊》第一八九期，文中指出此器乃是清代皇家祭壇、先農壇、先蠶壇時所用，並非一般的日用之器。

換句話說，若欲正確理解此器的使用脈絡，當將其置於祭祀、禮器的框架之中，這也是學界對此器的共同認知。而由祭祀、禮器切入考察此器的研究主要有二端：其一是以文獻圖像與此器相對合，如取《皇朝禮器圖式》為據，對合實物與書中所刊圖像，因而復原該器使用狀況者即是。只是，這些研究皆非專志於該器考察，故也僅止於復原、說明此器原有的祭祀使用脈絡。其二則是

擷取該器肩帶雙獸耳的形式特色，從而辨認出諸多同屬為「著尊」的器式，類推其共伴器物的真正性質，並以之開展禮器樣式傳播轉換的考察，此類研究以謝明良、許雅惠為代表。然無論何者，皆未關注此一器式在歷史推移中的轉變。今取宋代《重修宣和博古圖》（以下簡稱《博古圖》）所刊「著尊」（圖二）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相較，其肩帶獸耳的樣式雖存，但此一類同器式間



圖一 清 乾隆 黃釉雙獸耳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外形流變不可謂不大。則將其歷來器式搜集羅列，或可補充學界對此器樣式的認知，也更知清代乾隆朝之取院藏黃釉



圖三 聶從義《三禮圖》所刊之「著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書文獻處提供



圖二 《重修宣和博古圖》所刊之「著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書文獻處提供

雙獸耳罐為祭祀器皿，實其來有自。除此之外，作為此類器式最重要辨認特徵的獸耳，其「獸」所指究竟為何「獸」？筆者也將略述翻檢查索所得，以為來者深入探析此類祭祀用器的初步基礎。

宋元間雙獸耳「著尊」器式的流變

所謂「著尊」，是為祭祀用器「六尊」之一，為祭祀時裝盛祭品之用。然而，時代懸隔，文獻載記若無附隨圖像，後來者欲考訂、製作相關器物時，也只能參酌當時所見實物，結合文獻來加以推敲附會了。再者，更由於早期作為禮器的三代吉金往往長埋於地底而較少出土，以及時代好尚趨向等種種因素，其在宋初竊從義《三禮圖》中仍是一「赤中無紋」、器式簡單的「著尊」（圖三），要到同時代徽宗朝《博古圖》一書，方見以雙獸耳為圖像特徵的「著尊」載登。《博古圖》一書之圖像來源，並非尊文繹器、依經繪

器所成，其刊之著尊今雖不存，但北京故宮收藏之「鄭義伯鑑」（圖四），可能就是徽宗朝時人所見實物「著尊」的類似器。不論徽宗之判斷正確與否，自此之後，人們對於著尊樣式的認知，便別在《三禮圖》所刊無紋形簡的著尊圖像外，另立一器肩上有二獸首的「著尊」圖像傳統。而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的雙獸耳，其最早的圖像來源也可溯源到《博古圖》影響下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一書，《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中亦刊有同類似形制的「著尊」，只在器上紋飾略有差別。而以上二書所刊，略可代表「帶雙獸耳著尊」在宋代的樣貌。

元代時「著尊」的樣貌究竟為何？由於文獻無徵，今便以河南洛陽賽因赤達忽墓出土之陶著尊（圖五，以下簡稱「河南陶尊」）為例。若將之與《博古圖》、《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相對，便可輕易察覺「著尊」豐肩下斂的樣式雖變化不大，但在宋代滿布器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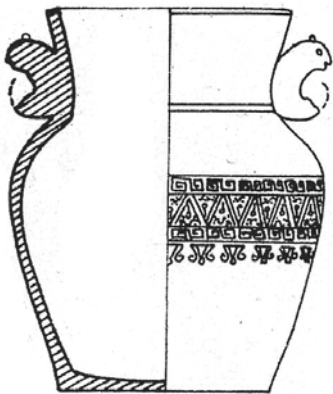


圖四 鄭義伯罇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分之二的紋飾，元代已縮小為壁上層疊的帶狀紋飾一周，其宋代口唇外折而束頸的特色，元代此器也變為侈口短頸的樣式，此一宋元間樣式的改變，實是朝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圓口略侈而短頸無紋的樣式邁進一大步。

明代雙獸耳「著尊」的兩種樣式

要知道明代雙獸耳「著尊」的樣式，略可由實物與文獻兩方面著手，傳世便有明代弘治年間製作之黃釉描金



圖五 元代河南洛陽賽因赤達忽墓出土之陶著尊線繪圖

雙獸耳罐實物（圖六，以下簡稱「弘治尊」），其肩帶雙獸耳的樣式，實為歷來「著尊」之重要特徵。且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樣式（圖一）幾乎全同，是清代器式之所仿承，也可視為清代祭器直承明代的重要證據。此即為明代「著尊」樣式之實物標本。此外，翻閱明朝欽定的《明集禮》一書，也可輕易發現書中所刊的「著尊」圖像。其中，《明集禮》卷二所刊「著尊」（圖七），器壁只見弦紋七道，此外並無其他紋飾；而同書卷七所刊者（圖八），其壁上紋飾所佔面積甚大，似可上接宋代圖書所

刊雙獸耳「著尊」樣貌。復次，《明集禮》所刊雙獸耳尊兩種，外形皆為侈口束頸，亦可見其與宋代《博古圖》傳統的關連。傳世雖未見此類明代「著尊」實物，但經彭盈真小姐告知，筆者方知韓國藏有其影響下製作的著尊實物，亦即附圖所示之朝鮮著尊（圖九）。其器壁依次而下的回紋地、卷草獸面、回紋地雲頭、覆瓣等紋飾，正與《明集禮》所刊者高度相似，且肩上亦有雙獸耳，具有「著尊」器式的重要特徵，也可再度確定朝鮮著尊的祭祀性質。

只是，朝鮮著尊直口而頸極短的樣式，實與《明集禮》所刊束頸有所不同，這正與朝鮮著尊對《明集禮》所刊紋飾亦步亦趨的追隨形成強烈反差，然其中原因為何，筆者並未知其確據。再者，便是同為有明一朝的「弘治尊」，也與《明集禮》所刊形貌相去有間。《明集禮》一書蓋由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所敕命撰編，理應為後來子孫各帝世守的矩

範，其影響所至，又何以有如斯之依違離合呢？若由《明集禮》前明世宗於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所撰序言來看，雖未足以釐清諸器式間相關的來龍去脈，但或可略明其經緯之一二。《明集禮》書序云：

《大明集禮》一書，我皇祖高皇帝（明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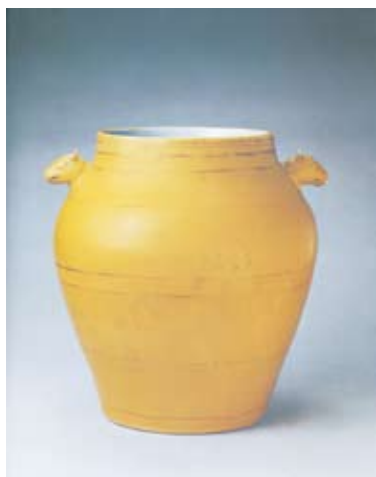
元璋）之所製也。……允為萬世之法程，子孫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昨歲禮部請刻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見，乃命內閣發秘藏，令其刊布，茲以訖工，遂使廣行宣傳，以彰我皇祖一代之制。

由其序言看來，《明集

禮》雖於明太祖時便編次完成，似在明世宗時方行刊布。事實上，《明集禮》代表明太祖在元明鼎革之初所訂的「初制」，只是明太祖不久便改「初制」而另有「定制」，《明集禮》遂深藏於內府而未獲頒行。後因明世宗「大禮議」事件而有變法之行，即以明太祖之「初制」來反制明太祖「定制」，其中原委，俱詳趙克生《大明集禮》的初修與刊布一文。因此，今見韓國所藏「著尊」圖紋全同於《明集禮》所刊圖樣，也可知此器製作時間必晚於明嘉靖九年（一五三〇）年。進一步來說，由於明世宗對該禮制變革的關注，故在《明集禮》書成之後，便命傳賜於天下，使此書所載器式圖像能見度更高，為朝鮮朝人仿學取用創造了更佳的條件。而這些歷史事實，便可稍稍寬解「弘治尊」與《明集禮》所刊相去甚遠的狀況。換句話說，由於早期《明集禮》編成後並未發布，故距離洪武朝不算太久的「弘治



圖七 《明集禮》卷二所刊之著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書文獻處提供



圖六 明 弘治 黃釉描金雙獸耳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朝鮮著尊
圖版取自《종요대제운율》一書



圖八 《明集禮》卷七所刊之著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書文獻處提供



圖十二 清 乾隆 貫耳直口瓶底外「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清 雍正 爐鈞袖雙耳出戟尊底外「雍正年製」篆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 乾隆 黃釉雙獸耳罐底外「大清乾隆年製」篆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尊」樣式，才能有發展生成與存在的脈絡空間。值得注意的，相對於《博古圖》到《明集禮》間皆存在的口侈頸束樣式，「河南陶尊」（圖五）無束頸的形式顯與「弘治尊」較為接近，而洪武「定制」如實為「弘治尊」形式的源頭，那麼「河南陶尊」的脈絡傳統，很可能即是洪武「定制」參考汲取的對象，成為影響、形塑「弘治尊」的潛藏因子之一。由此，我們也可以更瞭解與「弘治尊」同式的院藏黃釉雙獸耳罐。

院藏黃釉雙獸耳罐與其耳為何「獸」？

由於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底有「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篆款（圖十），且經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廖寶秀小姐提醒，其款識「年」字上半略似「山」字之構形，正與雍正時期之常見款識類似（圖十一），且其「製」字下方「衣」部，篆式亦較其他類型「大清乾隆年製」篆款周折

（圖十二），當是乾隆早年燒造的作品。有此資訊，便縮小了查找資料的範圍，因此，筆者便嘗試在《造辦處各作做成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清檔》，並在隨文括號內標註箱號與頁碼，如「一〇：二〇」表「Box No. 10, 頁10」）的早年記錄中翻查相關載記，隨即檢得乾隆十三年《活計清檔》之祭器成做相關資訊，此中正有乾隆皇帝對祭器成做樣式的指示：

司庫白世秀將祭器木樣上貼得篆字簽，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俱刻篆字款，往細緻篆，欽此。」……奉旨：「疏幕告按罇的顏色准用高麗布作，祭器上不應安蓋，不必配蓋。其疏幕上一角安錢兩個，交佛保鑄造，一面『天下太平』，一面『乾隆通寶』……其添做其邊豆罇等，面子何樣顏色，裡子亦要隨色，其罇均要合一，欽此。」（八九：五六六）

文中交代此器使用時應罩以疏幕、配以「天下太平」錢，此可促進吾人對此器使用實況的理解，今雖不能詳知其「天下太平」錢樣式，但院藏乾隆朝瓷質香插上有「天下太平」款之瓷錢（圖十三），或與《活計檔》所指形式相類，附記於此以為參照。此外，載記內正有乾隆皇帝指示款識「往細緻篆」的意旨，即為廖寶秀小姐所告知之「細緻」周折的款識樣式，恰可對應到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的成做時點。又「不必配蓋」之語，可說明此器成做之初便無配蓋的狀況，也與他件配蓋之獸耳罐

分別開來（圖十四）。重要的是，「面子何樣顏色，裡子亦要隨色」一語，恰指向了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圖一）與器式全同的「弘治尊」（圖六）間最大的差異點，亦即兩者外壁雖皆罩施黃釉，但內壁實有黃釉與白釉之別，解釋了院藏黃釉雙獸耳罐通體施黃釉的製作由來。以上種種，都增添了院藏黃釉雙獸耳罐與《活計檔》載記對合的可信度，換句話說，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很可能是乾隆十三年成做的器物。

至於院藏黃釉雙獸耳罐肩上雙耳究竟以何種動物為對象仿模製作？或者說，《博古圖》「著尊」似龍形異獸的雙

耳，其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獸耳的不同，是否只是因於仿模對象不同所致？事實上，「著尊」肩帶雙獸耳的特徵，雖早見於宋代《博古圖》中，但院藏黃釉雙獸耳罐之獸耳究竟以何獸為模擬象生的對象，個人並未能於清代之前文獻資料尋得相關訊息。徵之近人所述，或言其「似牛犢的小獸耳，即為『犧耳』」，或直指其「牛頭形耳」、「羊首」、「雙鹿頭耳」或只以「獸耳」帶過，都未深入申說其判斷理據。事實上，在刊有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最相似圖像的《皇朝禮器圖式》卷一中，便直指「該器兩耳為犧首形」，對於「獸耳」象生指陳的討論，似乎只能在此塵埃落定。只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皇朝禮器圖式》設色絹畫中，不但繪有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相同圖像，且圖像旁楷字說明云：「兩耳象鼠形」（圖十五）（註一），雖與《皇朝禮器圖式》載錄不一，卻顯示該問題尚有討論空間。而前引乾隆十三年《活計



圖十三 清 乾隆 雕瓷香插上之「天下太平」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 霽青獸頭帶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皇朝禮器圖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皇朝禮器圖式》所刊「太廟東廡尊」圖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書文獻處提供

檔》同一事件的記錄中，便有相關信息：

於五月初二日，司庫白世秀將壇廟內祭器紙樣十五

分，地壇、祇毅壇、夕月壇木樣十七分，各隨細目摺片交太監胡世傑、張玉呈覽。奉旨：「祭器內銅器交莊親王成做，瓷器交江西唐英燒造：……」

（八九：五六四）

再將取同年五月十二日

《奏銷檔》中有關和碩莊親王成做祭器的載錄對照，顯然為同一事件在不同檔案的記錄。

此《奏銷檔》中列成做尊器六種，就中犧尊、象尊、山尊、壺尊、著尊五種，均能於《皇朝禮器圖式》尋得同名圖像，又由於在《皇朝禮器圖式》中，「著尊」樣式並非採用肩帶雙獸耳的器式，而是與《三禮圖》接近的圖式，所以《奏銷檔》其間雖有「著尊」一項，但並非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同式之器物。復次，若將《皇朝禮器圖式》所刊尊器六種扣除前舉尊器五種，就只剩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同式的「正位尊」，而《奏銷檔》的第六種尊器恰名為「鼠頭尊」，這或許可加強院藏黃釉

雙獸耳罐之獸耳為鼠形的推測。

除此之外，乾隆二十年《活計檔》，載云：

太廟西廡一案所用祭器單：白磁爵三隻，外備用一隻；白磁鼠尊一個，蓋袱絨絡；白磁毛血盤二個；金漆木簋二件；金漆木豆四件，外備用一件；……。」（一〇〇：四六五—四六六）（註二）

為確認其「白磁鼠尊」所指，筆者便翻查《皇朝禮器圖式》所刊太廟西廡用尊，但書中並無圖像見載，惟其標明「同東廡，不另圖」，故再取觀是書所刊太廟東廡尊圖像（圖十六），正與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器式相同，書中復載其「形制同天壇正位」，而天壇正位尊又為其他正位尊樣式的來源，因此，院藏黃釉雙獸耳罐器式在《活計檔》中當被名為「鼠尊」，復又在是器周壁光素無紋的狀況下，「鼠」字稱名的來源，便是來自器上雙耳了。換句話說，院藏黃釉雙



圖十七 朝鮮著尊 圖版取自《중요대제운울》一書

獸耳罐的獸耳究竟為何獸？或許也可以有較為確定的答案吧。

結語

經由以上的討論，吾人對於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的器式傳統、流變及由來，便有了初步的認識。復次，因於清代檔案及圖冊的留存，院藏黃釉雙「獸」耳罐之「獸」為何指，也可較為確定。然而，基於這些考察所得，卻也望見了此論題尚有許多可以深入探析的空間。舉例來說，雖由《三禮圖》、《博古圖》可見兩種著尊器式傳統，然在其後的器式影響與流變間，仍有待更細緻

注釋：

1. 圖版取自《清史圖典 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二）一書。但筆者略事比對二〇〇七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之「清代宮廷典籍文化藝術特展」與王光堯，〈清代瓷質禮器略論〉（《故宮博物院院刊》總一〇六期）一文，推測該圖應出於成做在《皇朝禮器圖式》之前的《備位昭誠》，而非《皇朝禮器圖式》。也在此感謝施靜菲小姐與當時器物處數位典藏計畫共同主持人廖寶秀小姐贈送、賜閱相關圖版與書籍。
2. 類似的記載也見於「雍正元年-乾隆年間」之《活計檔》記載：「七月，活計庫……應交錢糧庫金漆簋一件、白磁爵一件、青玉爵三件、白磁鼠罇二件、黃磁豆四件……」（六〇：一八六～一八七）。不過因筆者尚未能判讀其確切年代，故於此附記。

參考文獻：

1. 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一九九三.三），頁一～二六。
2. 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九卷四期（一九九二.夏），頁一四三～一六八。
3. 趙克生，〈《大明集禮》的初修與刊布〉，《史學史研究》，總一一五期（二〇〇四），頁六五～六九。

的推敲，特別是一弘治尊」器式的生成與前代器式間關係，實需更為深入的考察，來補充這段空白。另一方面，院藏黃釉雙獸耳罐獸耳之獸為何指雖可確認，但該器以「鼠」為耳的原因為何？仍不得而知。特別是一取朝鮮著尊（圖九、圖十七）對照參看，其獸耳與鼠形亦有幾分相似，且嘴邊均刻有鬚，便使其為「鼠」形耳的可能性大增，這顯示即便文獻無載而難以徵考，但「鼠」形可能是考察器式流變的重要關鍵。此外，筆者在本文中曾推測「河南陶尊」與「弘治尊」

的關連，由線繪圖所見，「河南陶尊」的雙獸耳，也存在者「鼠形」的可能，若此一樂觀的推測為確，則「著尊」器式脈絡傳統將更添一分明晰。只是，「河南陶尊」僅見線繪圖發表，未見較佳圖版載登。也只能待之將來了。凡此種種，皆是此論題進一步開展的可能性，而本文之初步考察，也期待能為未來者深入考察的鋪墊。

※本文的完成得力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數位典藏計畫的協助，故本文實為該計畫執行成果的一部份，另圖版取得上承蒙圖書文獻處幫忙甚多，特此申謝。